

# 绪 论

我们首先来谈谈文化的基本涵义，据此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特征，并论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 一、什么是文化

现代社会，“文化”一词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但是人们在大量使用“京派文化”、“海派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概念时，未见得对“文化”概念的涵义作过仔细考究。因此，在开始我们这门课程时，有必要对这个概念先作一番分析。

文化是社会现象，它与人类社会是同时并存的。文化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成果，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物质和精神的产物。因此，凡是超越人的本能，属于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活动成果，都是文化。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区别于动物最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实践。劳动实践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向自然界获得生活和生产资料，但是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提供各种适合人类需要的现成事物，因此人类必须使用物质手段改变自然物的形态、结构、属性等，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例如：原始人为了抵御冬季的寒冷，从捕获的动物身上剥下皮毛，制成最初的“衣服”。这些原始的“衣服”虽然粗陋，但已经完全不同与野兽只会本能地利用自身的毛皮抵御寒冷。先民已经初步懂得改造自然，向自然获取生活资料了。这种物

质生活资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必须彼此协作，依靠集体的力量与自然搏斗，因此必须交流思想、传递消息，仅仅依靠原先动物式的鸣叫已经远不能满足复杂的思想需要了。于是原始人在劳动实践中逐步创造了语言和文字，成为思维的工具、交流的手段。除此以外，原始人还创造了原始宗教和艺术，这些都属于人类早期实践的精神产品。

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仅要创造产品，而且要创造“创造产品”的手段，最主要的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为了狩猎，原始人创造了石刀、石斧。为了耕种农作物，古代人发明了种植、培育谷物的技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具，创造了一套农业生产的工具和技术。

上述这些，无论是简陋的皮衣，语言文字，还是石刀、石斧、农业工具、技艺，等等，无一不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品，并非自然界提供的天然事物。于是，我们就将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称为“文化”。

文化与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了人就有了人的文化，有了文化也就有了人。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而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确证了人的智慧和本质力量，表明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确证了人及其社会的产生。文化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杰作，蕴涵了人类所具备的一切特征和能力，同时也蕴涵着人类精神世界（心理、道德、审美、信仰等）发展的历史积淀。

“文化”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它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从结构学的角度看，文化结构包括三大部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成果。物质文化包括：生产工具——技艺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室建筑文化、舟车交通工具文化等。物质文化的特征是可感性，即它是有形的、以器

物形态表现的文化。从文化的结构层次看，物质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表层。

制度文化是人们为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制订的各种规范、准则、条例、法律等，是以社会制度形式呈现的文化现象。具体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婚姻制度、家族或家庭制度、宗教制度、行帮会制度等等。它是一种“无形”的文化，但又确实实地存在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日常活动之中，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生活，是起劝戒或约束作用的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中层。

精神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式。社会心理是指人们非系统化、不定型、处于自发状态的思想意识，具体表现为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情感、风俗、习惯、信念、思想倾向等等。意识形式则是指理论化、系统化、具有较严密的逻辑体系的自觉的思想意识，具体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等。它们是对社会存在较为间接的反映，是经过提炼加工后形成的思想意识。精神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意识形式处于文化结构的深层。精神文化的特征是抽象性和相对独立性，是以观念形态呈现的文化现象，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精神文化必然在实践中转化为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文化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由于文化概念的涵盖面宽，因此我们在教材中将文化界定为“狭义的文化”，即人类的精神文化，而把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归结到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范畴中去，从而把对文化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到社会的精神文化上来。

当然，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物质生产以及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制约，人们的思想意识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存在。因此，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必然要联系古代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以及政治上层建筑的实际状况，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考察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概括总结传

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由华夏各族人民经过世代奋斗所创造的丰厚的精神产品。本书拟重点介绍殷商之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化史及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就。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以个体家庭农牧业为内容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在这种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 （一）兼容并包

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时产生的几大文化，如“两河文化”、“玛雅文化”等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了，而中国文化的传统却能历久弥新，影响至今，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特征。

首先，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同化力。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以后，大多逐步“中国化”，融和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具典型性的例子就是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过程。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本土以后，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逐渐走向鼎盛。在佛教流传的过程中，来自印度文化中的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成果相互融和、贯通，终于在唐代相继形成中国佛教的四大宗派。其中，被称为“本地风光”的禅宗，自觉地与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融为一体，尤其适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

从佛教逐步中国化的过程看，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一方面始终保持住自己的主导地位，不为外来文化的冲击所瓦解；另一方面，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基础上，不断地发展自身。

其次，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和力。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在数千年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使中国文化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

展。中国人口中汉族占大多数，汉族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样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和所取得的成就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融和、共同发展的结晶。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蕃之间的联姻，大大促进了汉藏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藏族人民向汉族学习先进的耕作技术以及水利、纺织等技术，汉族人民也向藏族学习建筑艺术、音乐、舞蹈、工艺美术以及宗教、学术思想等。

唐太宗非常重视与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当时大唐的国都长安成为中外文化汇合的中心，来自南亚的佛学、医学、音乐、美术，来自西亚的宗教、建筑、音乐、舞蹈等都被开放的唐文化广泛容纳、吸收，唐文化因此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灿烂景象。这充分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对各民族文化的融和。

## （二）道德至上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提倡社会和个人道德理想的实现。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把追求个人的自我完善看作生命价值之所在。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德行文化。

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比较开明的君主都把治国安邦作为实现统治的根本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一定的道德规范去统摄人们的思想，制约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的各种关系。只有人心齐了，各阶级、各阶层的人都安于本分，恪尽职守，这个社会才可能和谐统一。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还是道德治理。它把人间最具普遍性的社会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并规定了各自的道德要求，这就是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弟、朋友友善谦和，试图以这些道德规范去治

理社会，调节各种关系。

道德不同于法律，是非强制性的，是需要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最终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绝对律令”。因此，这些规范必须“内化”为人的道德理想，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既然重视伦理道德，就必然倡导自我修养、自我完善，使这些道德规范成为个体自我约束的内在要求。《礼记·大学》开宗明义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的社会理想就在于表彰一种崇高的道德，并运用它去教化民众，使民众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这既是《大学》的纲领，也是中国文化的纲领。

受到道德至上思想的熏陶，中国人历来注重气节、情操、修身等道德生活，重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 （三）家族中心

传统社会受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制约，家庭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家族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事务都必须在家族内部进行，每一个人都被家族关系紧紧束缚和制约着。

由于家族在社会关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家族观念深深渗透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与家族观念紧密配合并相互适应的是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祭祀祖先的礼仪制度、家法族规的法律制度、“修齐治平”的治国方略等。

中国人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是由于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宗法关系和宗法制度始终长久而顽强地维持了下来，家族——血缘关系始终在社会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与此相应的就是血亲意识和“孝悌”的伦理观念。古代圣贤以及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提倡以孝治天下。《孝经》云：“孝，德之本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种以家族为中心、以孝道为内容的思想意识，归根结蒂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在古代中国，家庭和家族既是人们生息繁衍的处所，又是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樊篱。

#### （四）务实精神与恒久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千百年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铸就了中国文化务实求稳的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以及具有循环论特点的恒久意识。

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重实际黜玄想”的特征，不注重纯粹思辨的“形而上学”，较少关心诸如“自然、宇宙本质”此类的玄思，而较多关注政治（治国平天下）、伦理道德（修身、正心、格物致知）等关系到国家兴亡、立身处世的现实问题。道家和佛教虽注重对宇宙本体的探究，但落脚点仍在伦理或政治问题；更何况佛教原是印度文化，其气质和志趣与中国传统文化原本有较大差异。

中国古代学者并不讲究逻辑推论，不像西方学者那样着力于概念的确定、体系的构建。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一般无细致繁琐的证明，也无条理系统。他们往往认为只要能解释生活现象，在实践上使人得到受用就已经足够了。学问能与经验贯通，观念能与实际契合本身就是真的证实，而不必做概念、逻辑的过多推敲。因此，中国文化人的治学方法是“注重实际，讲求效用”——一种实用理性的方法。

古代中国农业社会是区域性的小社会，农民在故土之上世代耕耘，很少迁徙；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的方式，较少与外界交换往来，社会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人们往往以扎根本土、安心务农为荣为乐，而把外出经商视为不务正业的行为，予以鄙视、谴责。在这种背景下生长起来的传统文化，“安土乐天”、追求稳定恒久的意识极其浓厚。

虽然中国传统思想中谈到“变易”的地方很多，但中国文化的宗旨是在探求“变易中的不变”、“有限中的无限”，追求人生、社会、宇宙中的永恒、久远，发现宇宙万物生灭变化中某种循环往复的恒久规律。老子说“天长地久”，《易传》云“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董仲舒曰“天不变，道亦不变”，其精神实质都是强调宇宙的恒久、稳定之道。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始终洋溢着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保持充分肯定的态度。然而，在这种现实乐观的精神背后隐藏着宿命的观念，有一种对命运感到不可捉摸、无法把握的无可奈何。

### （五）崇尚权威

中国文化有崇尚古老和崇尚圣贤的历史传统。历史上的圣人贤士以及他们留下的思想言论总会引起人们的无限景仰崇拜之情。中国文化这种崇尚权威的特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重经史，以儒家经典为思想权威。春秋末期，经过孔子的编撰整理逐渐确立了代表儒学的六部著作即《诗》、《书》、《礼》、《易》、《春秋》和《乐》。孔子身后特别是西汉时期经过几代帝王的极力推崇，这六部著作上升为“六经”。

自汉以来，中国的文人纷纷为“经”作“传”、作“注”、作“疏”，耗尽毕生精力去考据、阐释。随着历史演进，解经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其中不少著作往往假借经义，实质是自我发挥，阐发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这是由于中国人一向认为只有古代圣贤的学说才是最完善的思想。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就必须从古人的经典中寻找依据，取得理论的支持，才能令别人信服。即使是冲破旧的思想牢笼，也只有采取“托古”的方法，才能得到世人的认同。

中国人注重经学，还有一大原因就是治经与出仕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企图步入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往往带着功利的目的，走上了艰辛的科举之路。早在汉朝，官方就设立“五经博士”，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隋唐时，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考试主要内容就是由皇家编定的儒学经典，不少秀才、举子皓首穷经，只是为了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并不想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明清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没落阶段，经学以及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严重。明代敢于反潮流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曾对当时经学的腐朽风气予以深刻批判，并对孔孟权威提出了挑战：“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

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中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焚书》卷三）这番话切中了经学家把“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奉为“万世之至论”，以此禁锢人的思想的弊端。

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领域。自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正史体例之后，修史传统持续两千年之久。古代史学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书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论证作用以及对世人的劝惩作用，即“正史体尊，义与经配”，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后，总要为前朝修撰史书以资借鉴。

由于统治阶层的提倡，中国人特别重视研究历史。清代以前，仅是经历代皇家钦定的正史就有廿四部。1921年和1926年，近人又完成了《新元史》和《清史稿》，这样长达五千年之久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演进史，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据统计，光是从《史记》到《明史》（二十二史）就有四千万字，三千二百四十九卷，而古代留下的历史文献更是浩如烟海，这说明了古代文人对史学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这种情结的背后是对前代圣君明王、忠臣贤士的崇敬、仰慕以及对理想社会的神往。

其二，重“复古”，以古代先王的理想社会为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先王”的世道是最理想的。儒家对三皇五帝的时代尤为推崇。黄帝、尧、舜、文王、武王、周公等被尊奉为古代圣贤，他们治理的社会是“太平盛世”。道家认为远古“小国寡民”、“结绳记事”的蒙昧时代是理想社会，但在进入文明时代后，社会的自然状态被破坏了，社会的礼教压抑了人的天性，物质财富的聚集、社会成员贫富分化造成了人道的沦丧，加深了社会的危机。

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儒道两家的社会理想都是复古主义的，都主张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是向过去某个时代的回归。这实质上是相信古人的智慧一定超过今人，古代的政治一定胜过今天。这种

文化心态往往使人对圣贤的教诲、祖宗的遗训有着宗教般的崇拜，将其视为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永世尊奉的偶像。

### （六）追求中和

中国传统思想的最大特色是贵和谐、讲中道。

古代思想家历来注重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和谐统一，包含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儒家经典《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宇宙万物既存在差异，但就其本质和根源而言，又是统一的，因此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整体的宇宙观。

“中道”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也是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原则。它特别强调事物的度，强调解决矛盾的适度原则，强调为人处世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就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深远影响的“中庸”之道。

“中和”观念充满辩证精神，是传统思想家通过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缜密透析而得出的理论总结。

## 三、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传统文化是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之适应的新文化，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之间是否能够兼容？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对传统文化的内容作细致的分析。

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因此，传统文化精神有着与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的内容，如务实求稳的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具有循环论特点的恒久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天道观，等等。

传统文化是在封建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制约影响下生长起来的，它肯定会包含不少封建的意识形态，如“忠君尊王”的思想，社会等级差别的观念，“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等等。

传统文化又是古代思想家对宇宙、社会、人生思索而产生的，它凝结着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天人观和知行观，“刚健中正”、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等等。

既然传统文化包含着上述几方面的内容，因此对待传统文化必须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方法，看看其中哪些是已经过时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东西，哪些是封建主义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害无益的东西，哪些是具有永恒价值、对现时代新文化依然有益的东西，哪些是经过改造依然可以在今天被利用、供借鉴的东西。

传统文化中与现时代相冲突的主要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那些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宗法制度的陈腐观点肯定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法治观念和新型的人际关系等无法共存，必须坚决摒弃。

至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某些观念则相当复杂。如“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求的“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应该加以抛弃。但有些观点，如“务实精神”、“现实主义”、“乐观精神”等对于现时代则依然是可取的，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依然是有益的。

传统文化中代表民族精神的精华，如“刚健中正”、“自强不息”的精神；“爱好和平”、“讲究气节”、“坚忍不拔”等立身之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等，则具有永恒的价值，在现时代仍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弘扬光大。

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系统地加以认识，既不美化或掩盖其中的瑕疵，又不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要以“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扬弃”的辩证法正确对待和处理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使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社

会主义新文化，依靠所谓“儒学的全面复兴”是不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承担起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把中国文化的火炬传向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建立起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宏伟的文化殿堂。

### 参 考 文 献

1. 许苏民：《文化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 孙凯飞：《文化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3.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略

##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构建

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的发祥期可追溯到旧石器时期。但它的突飞猛进却应提到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

### 一、中国文化的源头

新石器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重大发展特征是农业、畜牧业开始取代原始时期的狩猎和采集。除此之外，先民们已经发明陶器制作工艺，不仅能制作黑色陶器，而且能制作彩陶，制陶工艺达到相当水准。在这个基础上，先民们创造的精神文化就是原始的艺术和原始宗教。

原始的艺术品主要是陶塑、陶绘、木雕、骨雕、石雕。陶塑人头像，隆鼻、凹眼、大耳、耳垂有穿孔，可见当时人们有在耳朵上悬挂装饰物的习俗。陶绘的内容有鱼形纹、圆点勾叶纹、三角形、方形、菱形等几何图案，原始雕刻以平面线刻为主，内容有人像、农作物、鸟兽、太阳星云、月亮等图案。原始歌舞模仿劳动、祭祀的动作或过程。这些都反映了人类进化的程度。

原始宗教经过了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几个阶段。中国先民图腾崇拜的偶像主要是对龙的崇拜。龙是各种动物的综合，是由飞禽、走兽、游鱼拼合而成的虚拟动物，角似

鹿，头似蛇 眼似龟 项似蛇 腹似蚕 爪似鹰 鳞似鱼 掌似虎 耳似牛。龙已逐步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

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

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北部。华夏集团内分为两支：一支是黄帝，另一支是炎帝。黄帝、炎帝既是氏族首领的名字，又是该氏族的名称。因此，我们中国人往往自称“炎黄子孙”。黄帝是五帝之首，炎帝是他的弟弟，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始祖契是帝喾的次妃简狄的儿子，周人始祖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嫄的儿子。因此，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祭祀的先祖，华夏文化是中华古老文化的代表。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是今天山东、河南东南部和安徽中部一带。五帝中的太皞、少皞以及曾与黄帝恶战过的蚩尤、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等都属于此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伏羲、女娲，还有三苗、驩兜、祝融氏等都属于这个集团。

三大文化集团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蚩尤与黄帝在“涿鹿之野”决战，尧与苗蛮激战于“丹水之浦”，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冲突的结果是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巫教风俗在两湖三湘之地流行开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 二、殷周文化

### （一）青铜时代的“天命”观

商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比上古社会在生产力上有了长足进步，其重要标志就是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到商代晚期，青铜冶铸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到殷周之际，青铜器制造进入鼎盛时期。

从商代中期起，青铜器的生产扩大到长江流域的江西、两湖等

地。

与发达的青铜器生产相适应的，则是殷商的奴隶制度以及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主流是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商代奴隶主信奉“上帝”，认为帝是天上最高统治者，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人类的主宰。除此以外，商人还崇拜祖先，先王先公可以宾于帝、配于天，获得与上帝类似的权力。因此商代统治阶级对先王的祭祀名目繁多、仪式隆重。这种以神为本的意识在青铜器的形状和纹路上必然有所反映。

商代的青铜器多铸有或刻有非牛非马、非虎非豹的“饕餮”纹饰，使人感受到神秘、敬畏的外在威慑力，象征奴隶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势，夔龙、夔凤、鸱枭等动物形象加上青铜器皿坚实、厚重的造形，象征着超现实的神力，体现出原始的宗教情绪。

商人信天信鬼，同时又迷信占卜，事无巨细都要问卜。占卜的方法是将牛胛骨或龟甲放在火上烧炙，甲骨表面出现裂纹，古人称之为“兆”，然后根据“兆”的形状来断吉凶。当时卜官将所占问的事和吉凶情况以及日后应验的情况一并刻在兆纹旁，这就是“辞”。从这些辞中可以看出当时君王问卜的范围很广，天时、年成、祭祀、征伐、田猎、疾病等大小琐事都有。安阳殷墟先后出土的甲骨刻辞约十万片，当时问卜之风的盛况可见一斑。

商人惧怕鬼神，日常起居有各种忌讳，弄得整天神经紧张，疑鬼疑神，生怕犯了忌讳，引起鬼神作祟。为了取悦鬼神，残暴的殷王不仅虔诚祭祀，还要残杀生民以事鬼神，所以商代用活人殉葬成风，甚至一次要斩杀数百奴隶，埋在墓穴周围，为主人消灾避祸。

## （二）敬德保民——周文化的转变

商人迷信，崇拜天帝，把上帝看作有意志、有感情、能支配宇宙和社会秩序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商代君王又把自己的权力神化为“受之天命”、“帝立子生商”，企图把王权说成是亘古不变、无法违抗的绝对力量。殷亡以后，这种“天命”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

首先，周代思想家提出了“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观点，改

变了天命恒常的旧说。他们把寄希望于“天命”来维持政权的稳固持久，改变为寄希望于君主的德行和行使权力的正确；把对社会以外的异己力量——天的崇拜，转为对社会的主体——人的信念。这种观念与商代那种机械、僵化的天命论比较，无疑是一种观念的革命。

其次，针对殷亡的惨痛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在殷周政权更迭的历史变故过程中，“民”的力量终于显示出来了，统治阶级也终于明白了这样的真理，真正可畏的并非“天命”，而是他们从来不屑一顾的“民心”、“民力”。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抑制自己不恰当的行为和过分的奢华，还要“与民休息”，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保持国家的平安。这反映了西周初期民本思潮已开始萌芽，在破除了殷周奴隶主阶级“天命观”的新时代，“以民为本”的观念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 （三）《周易》——中华文化之根

《周易》流传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春秋时期已被视为重要的典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经典。《周易》影响之深远，世所罕见。

《周易》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渊源。在同域外哲学思想接触之前，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关于人生、社会、宇宙的智慧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而获得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思想都与《周易》有着渊源关系。

17 世纪初，《周易》开始传入西方。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它包含着“二进制”数学。丹麦现代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玻尔 1937 年来华访问时见到太极图，惊诧不已，认为太极图的形象表达了他的“互补”原理。国外许多学者把《周易》作为潜科学对待，把它同“相对论”、“元素周期表”、“生物遗传密码”联系起来。美国、日本等国学者还把《周易》运用于现代决策管理。许多国家的大学生都读过关于《周易》的书籍。《周

易》越来越有吸引力。

《周易》原是古代占卜用书（汉代起又称《易经》），成书大约在殷周之际。殷人占卜，使用龟甲、牛胛骨。到了周代改用蓍草，称为“筮”。占筮时记录下来的文字即为筮辞，《周易》一书就是根据卜辞、筮辞编辑整理的成果。相传孔子作《十翼》（即《易传》）从理论上解释卦象。

周代设卜官，专司占断之职。当时卜书并非《周易》一种，古书记录当时曾经流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直至春秋仍“三易并占”。只是在历史沿革中，前两种易书相继亡佚，如今仅存《周易》一种了。《连山》以“山”为万物之本，《归藏》以“地”为万物之母而《周易》以“天（乾）”为万物之源。“三易”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认识自小而大、由近及远、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

关于《周易》的名称有过多种解释。一般认为“易”含有变易、简易、不易三层意义。“周”是朝代的名称。也有人认为“易”即“卜”，“周”乃周而复始、无有穷期之意。

《周易》最基本的元素是“爻”爻组合为“八经卦”八经卦又重叠组成“六十四卦”。爻分阴爻和阳爻，用“—”和“--”表示。阴、阳爻按三画重叠，分别排列组合，便形成八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在八经卦的基础上，加以推衍，两两重叠，分别组合，便形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如“乾”☰、“坤”☷等。

《周易》赋予爻和卦不同的象征意义，因此在《周易》中又称它们为“爻象”和“卦象”，如阳爻代表宇宙间阳刚性质的事物，而阴爻则代表宇宙中阴柔性质的事物。八卦代表宇宙的基本物质元素及其现象，如乾——天，坤——地，震——雷，巽——风，离——火，坎——水，艮——山，兑——泽。八卦所代表的自然事物之间有着相反相成的联系，两两之间，性质相反，但又彼此相依，相互影响，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说卦传》）。这实际上包含着中国古代最基本的自然哲学观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